赵斌斌，蔡弘．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2）：68-75.
ZHAO Binbin，CAI Hong.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lan network and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20（2）：68-75.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1.02.009

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

赵斌斌，蔡弘
（安徽建筑大学 城市管理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Probit模型，探索了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了两者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积极影响；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性别和家庭规模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间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社会保险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待遇可携带型差，反而减弱了宗族网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而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的不足提升了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传统宗族网络关系的现代生命力，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基础上，开发更多针对流动人口的商业保险，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农村宗族网络；农业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险；商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1）02-0068-08

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显示，2016年至2018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而且农村收支增速明显高于城镇，但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值要高于农村居民收入近两倍，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教育、医疗、消费、政府公共投入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增收，这也是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战略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虽然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不断呈增加状态，但“候鸟式”和“钟摆式”的转移特征较为显著，并没有摆脱城乡二元限[1]，这种劳动力转移模式不利于转移人口收入可持续增加，也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农民个体在考虑外出务工时，不仅需要考虑经济问题，更要考虑家庭照护问题，这就说明外出务工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可能牵涉到家庭因素，同时还有可能涉及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那么农村宗族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是否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正式制度是否与非正式制度起到协同作用？宗族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是维持农村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治理基础，它更多的体现出社会资本的关系和认知特性，通过资源型资本和规范性资本形成农村治理体系。在宏观层面上，宗族网络关系到整个农村治理的稳定性，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微观层面上，是个人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体现，是维护个人情感的重要纽带。基于这些认识，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丰富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认识，聚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发展的情景，对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第二，将农村宗族网络分为规模、强度和亲缘三个层面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传统研究中将宗族网络分为规模和强度两个维度，而宗族内部

收稿日期：2020-08-21 **修回日期：**2020-08-31
基金项目：安徽建筑大学博士启动基金（2019QDR07）
作者简介：赵斌斌（1991-），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E-mail：ahjzhao@163.com

的最重要的血缘关系往往被忽略，故本研究将亲缘关系的互动加入宗族网络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宗族内部研究。第三，分析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和市场提供的商业保险对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是否产生调节作用。本研究将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纳入一个研究体系中，既丰富了我们对宗族网络作用的认知，也对社会各类保障制度的作用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拓展了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第四，将宗族网络的概念赋予了经济学的意义，宗族网络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领域，那么本研究将单一学科的概念拓展至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这对宗族网络实践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操作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宗族网络原属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领域，宗族是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性共同体[2]，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显性和隐性体现的综合体，宗族内部可以共享组织的资源，例如土地、声誉或市场信息等。宗族网络是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自然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私有产权和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农村企业发展，最新的研究也表明了宗族网络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根基[3-4]。同时宗族网络在风险分担[5]、乡村经济发展[6]、企业创新[7]、金融发展[8]等领域中都得到了学者们深入的研究，但少有学者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研究宗族网络的作用，发现祠堂和家谱的存在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力有效流动，即宗族网络有助于劳动力转移[9]，基于城镇化背景，通过对农民工集聚地区的研究发现，先来的农民工对同村人员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即城乡劳动力存在“传帮带”的先驱效应，但这种效应也侧面反映出现这种效应所带来了农村劳动力流失的客观事实[10]，宗族网络对农村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进个人发展的经济学视角。在经典的劳动供给模型中，闲暇是一种正常商品并且工作本身不具有直接效应的前提下，非劳动收入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会减少个体劳动供给水平。宗族网络中的同宗互助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非劳动收入，通过宗族网络能够获得有效信息资源，进而促进人员城镇聚集，即对农村劳动力供给是一种正面影响[11]。同时在企业的实际运作中，宗族关系可以保持良好的雇佣关系，在这种强宗族网络的干扰下，个人能获得就业的机会就会增加，从而增加收入的概率也会提升。

其次，维护亲缘关系的羁绊性视角。亲缘关系是宗族网络形成的纽带，认为社会网络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通过提供以人情为主、信息传递为辅的路径实现[12]。在宗族网络中亲缘关系所带来的的互助性帮助能够在信息和资源上给个人带来帮助。而且农村创业者十分依赖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宗族网络[13]，若宗族网络内部关系越紧密，那么发展与宗族有关的事业动力越强。

最后，维护群体利益的群体性视角。费孝通通过“差序格局”的概念指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是中国农村最稳定的社会网络[14]。宗族网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非正式组织形式，外部成员很难进入其中，而组织内部容易形成资源和声誉共享机制[15-16]。宗族网络作为中国乡村文化中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差序格局”，也在农村问题研究过程中受到广泛关注。在商品竞争中，依托宗族网络提供的资源能够为宗族成员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特别是在非正式产权保护[17]、扩大融资渠道[18]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以宗族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与市场机制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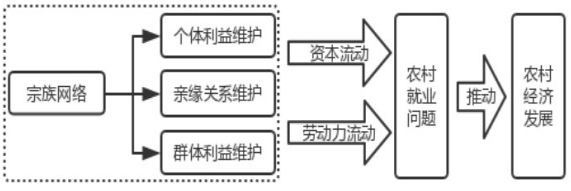


图1 宗族网路的作用机理

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1：农民所处的宗族网络的存在将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

与宗族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隐形作用表现不同，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作为正式制度，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到显性作用，它对人们的基本生存保障起到重要支持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非正

式制度作为传统文化能够一直延续至今，它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正式制度更是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协同发展。而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意愿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首先，补偿溢价理论发现社会保险制度能够使农民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正是这种补偿溢价可能导致“懒汉”心态的产生，进而导致劳动力转移降低[21]，一些定性研究发现农村低保对受助个体就业存在潜在的负向激励风险[22]。另外，研究发现低保与个体工作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该结论意味着农村低保存在引发负向就业激励的可能性[23]，研究证明了新农合降低了人力资本较高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24]，新农合增强了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25]。

其次，外出就业人员会更倾向购买商业保险[26]，商业保险是需要主体根据自身需求购买的，而且主体购买的额度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富裕的农民家庭为了避免出现各类健康、安全风险，会更加倾向商业保险购买，而为了承担这些费用，家庭个人也会增加外出务工意愿。同时从经济因素角度分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远低于外出务工，研究证明农村家庭劳动力转移可以使家庭人均收入提高10.6%[27]，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有可能更倾向于外出务工，从社会因素角度分析，商业保险能够提升个人的风险意识，增加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动的过程[28]，那么个人会更加希望参与城镇化进程中，提升自己社会阶层和增加社会资本。

故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新农合保险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2b：商业保险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二、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主要涵盖个体、家庭、社区（村居）三个层面的数据，为了更加详细的刻画宗族网络、社会保险以及劳动力转移三者之间的联系，本研究对三个层次的数据进行了匹配。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居委会（村委会）的外出就业比例（LM1）以及家庭成员是否有外出打工（LM2）作为被解释变量来代替劳动力转移。

本研究以宗族网络为解释变量，而在衡量宗族网络时，大部分的研究只考虑的村级单位下的宗族关系，即用宗族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来刻画宗族网络，而忽略了宗族网络中最基础的维度，即亲缘关系。由此本研究在此基础上，使用“家庭所在地区大性占比”作为宗族网络规模（NS1）的代理变量，选用“家庭成员是否参加祭祖扫墓”作为度量宗族网络强度（NS2）的代理变量，采用“亲戚间是否经常来往”作为衡量亲缘关系（Kindship）的代理变量。但三个变量分开研究无法体现宗族网络（Clan）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故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将其综合成一个变量。

同时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调节变量，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个维度来衡量，选择使用社区家庭中参加新农合制度的人数之和，并进行对数处理，将其作为衡量社会保险程度（LnSI）的代理变量；用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处理家庭人口规模，得到“家庭人均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并进行对数处理，将其作为度量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程度（LnCI）的指标。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研究选取人均收入、农业生产总值和非农业生产总值作为村级经济特征变量；选取家庭支出和政府补助作为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具体变量解释见表1。

（二）描述性统计

上述变量及相应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从表中可知，在外出务工方面的统计结果显示，37.58%的农村人口选择外出务工，而且52.35%的家庭选择外出务工，外出务工人员较高。在宗族网络方面，平均每个村居大性占比38.63%，每个村居拥有的祠堂为0.43个，亲戚间的熟悉程度为1.87，说明宗族网络在现代农村扮演了越来越弱的角色。

表1 各变量、赋值及单位

变量		赋值	单位
因变量	社区外出就业	农村社区外出就业比例	LM1
	家庭外出就业	农村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成员：1是，0否	LM2
自变量	宗族网络规模	农村社区大姓占比	NS1
	宗族网络强度	农村社区拥有祠堂的数量	NS2
	宗族亲缘联系	亲戚间关系是和睦程度，从1至5依次升级	Kinship
调节变量	社会保险程度（取对数值）	农村家庭社会拥有新农保人数的对数	LnSI
	商业保险程度（取对数值）	家庭人均商业保险支出：农村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家庭规模的对数	LnCI
控制变量	人均收入（取对数值）	农村社区人口平均收入	LnGDP
	农业生产总值（取对数）	农业生产总值的对数	LnGAP
	非农业生产总值（取对数）	非农业生产总值的对数	LnNGAP
	家庭支出（取对数）	家庭总支出的对数	Expense
	政府补助（取对数）	政府补助总额的对数	GSP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M1	37.580	22.709	0.000	90.000
LM2	0.523	0.499	0.000	1.000
NS1	38.631	26.041	0.000	100.000
NS2	0.432	1.678	0.000	16.000
Kinship	1.874	0.870	1.000	5.000
LnCI	7.198	0.851	1.791	10.596
LnSI	0.971	2.276	0.000	9.498
LnGAP	5.203	1.706	0.000	9.566
LnNGAP	5.013	1.771	0.000	9.210
LnGDP	8.232	0.838	5.010	10.714
GSP	4.506	3.131	0.000	11.121
Expense	10.235	0.950	5.298	15.449

（三）研究模型构建

为了系统研究宗族网络、社会保障与劳动力转移三者之间的关系，故此设计了计量模型来估计三者的关系，模型如下：

$$LM1/LM2 = \beta_0 + \beta_1 NS1/NS2/Kinship + \beta_2 LnGDP + \beta_3 LnGAP + \beta_4 LnNGAP + \beta_5 LnE + \beta_6 Fv5 + \varepsilon$$

$$LM1/LM2 = \beta_0 + \beta_1 NS1/NS2/Kinship + \beta_2 NS1/NS2/Kinship*LnSI/LnCI + \beta_3 LnGDP + \beta_4 LnGAP + \beta_5 LnNGAP + \beta_6 LnE + \beta_7 Fv5 + \varepsilon$$

模型1主要研究的宗族网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而模型2是基于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关系的作用。当被解释变量为社区外出比例时，采用的是OLS回归，当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外出就业时，采用Probit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

三、回归分析

（一）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上面的模型估计宗族网络对外出务工的影响，首先是以农村社区为单位，采用OLS回归测算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其次以家庭为单位，采用Probit回归方法来检验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从表3的内容可知，首先，宗族网络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劳动力向外转移，宗族网络的作用是需要本地宗族网络带来的扶持，那么网络中的节点越多，那么覆盖面就会越大，“传帮带”的先驱效应表现的更加明显，由此所带来的影响就会越大；其次，宗族网络强度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社会和家庭潜在风险抵御能力，增强节点之间的联系，消除外出务工的人员心理顾虑，从而促进劳动力转移，这与郭云南和姚洋观点一致；最后，宗族网络中亲缘关系能够显著提升个人对于相关资源的获取程度，进一步增强节点间的交流过程，从而能够享受本地宗族网络带来的帮扶作用，而综合这三个维度的模型（4）和模型（8）显示，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二）拓展性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关系

表3 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

	(1)	(2)	(3)	(4)	(5)	(6)	(7)	(8)
NS1	0.127***				0.002***			
	(11.73)				(2.59)			
NS2		1.691***				0.054***		
		(10.26)				(5.20)		
Kinship			1.031***				0.056***	
			(3.16)				(3.03)	
Clan				3.905***				0.101***
				(14.27)				(6.35)
LnGAP	-1.102***	-1.496***	-1.403***	-1.352***	0.012	0.005	0.008	0.010
	(-6.14)	(-8.37)	(-7.68)	(-7.51)	(1.14)	(0.44)	(0.78)	(0.95)
LnNGAP	1.360***	1.488***	1.435***	1.324***	0.032***	0.034***	0.032***	0.030***
	(8.08)	(8.83)	(8.28)	(7.76)	(3.20)	(3.42)	(3.21)	(3.01)
LnGDP	-0.603*	-1.307***	-1.179***	-0.698*	-0.158***	-0.168***	-0.164***	-0.154***
	(-1.67)	(-3.65)	(-3.21)	(-1.92)	(-7.46)	(-8.02)	(-7.83)	(-7.31)
GSP	-0.170*	-0.215**	-0.262***	-0.1481	0.026***	0.026***	0.025***	0.028***
	(-1.90)	(-2.40)	(-2.82)	(-1.61)	(4.89)	(4.98)	(4.63)	(5.17)
Expense	-0.976***	-1.122***	-1.041***	-0.864***	0.184***	0.182***	0.188***	0.190***
	(-3.36)	(-3.86)	(-3.48)	(-2.94)	(10.71)	(10.61)	(10.83)	(11.01)
_cons	47.251***	60.362***	57.164***	53.100***	-0.925***	-0.759***	-0.924***	-0.946***
	(11.49)	(15.21)	(13.63)	(13.12)	(-3.83)	(-3.27)	(-3.86)	(-4.04)
N	6325	6325	6325	6325	6325	6325	6325	6325
adj. *R2*	0.041	0.037	0.023	0.052				
Pseud R2					0.025	0.027	0.025	0.028

中性别和家庭规模之间的差异性，故本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量调整为女性或男性占外出务工的比例，来研究性别之间的差异性，表4的结果显示，宗族网络对男性和女性外出务工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受到的影响远高于女性。出现这种结果原因主要是由于，本地宗族网络强度越大，越能够消除男性心理顾虑，从而促进其外出就业，另外亲缘关系能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帮助，而且这种关系在男性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农村非常流行，在家照顾老人、看孩子、处理家务劳动等成为女性的天职，女性通常会被家庭事务束缚，而男性则可以外出务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在男性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而在研究家庭规模之间的差异性，本研究以是否外出打工为被解释变量，由表4可知，家庭规模显示出对宗族规模与劳动力转移关系的正向影响，即家庭人数越多，家庭成员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而单人户、两人户和三人户并没有表现出两者之间的显著性，其原因是四人户和四人户以上则由于家庭负担太重，可能需要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来减轻家庭负担，而且四人户及以上外出家庭成员中有人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这时候更能放心外出打工，而单人户可能是独居老人，外出务工的概率很大程度降低，两人户和三人户由于家庭中可能有老人或小孩，而且外出很有可能无法照顾这些人，导致宗族网络无法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作用

表5中列（1）是在宗族网络与农村社区就业比例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增加了宗族网络与社会保险的交互项，列（2）是在宗族网络与家庭外出就业的关系基础上，增加了宗族网络与社会保险的交互项，其列（1）结果显示，社会保险对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虽然列（2）的交互项虽未表现出显著性，但交互项仍为负，由此综合来看，社会保险对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由此假设1a得到验证。由于社会保险作为政府提供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政策保险制

表4 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差异性

	性别		家庭规模				
	男性	女性	单人户	两人户	三人户	四人户	四人以上
Clan	3.160***	-3.141***	-0.075	0.035	0.053	0.102***	0.130***
	(13.90)	(-13.85)	(-1.06)	(0.87)	(1.44)	(2.61)	(4.88)
LnGAP	0.038	-0.038	0.050	0.040	0.002	0.007	0.007
	(0.25)	(-0.25)	(1.04)	(1.46)	(0.08)	(0.30)	(0.43)
LnNGAP	1.181***	-1.183***	0.041	-0.005	0.017	0.017	0.054***
	(8.33)	(-8.37)	(1.00)	(-0.21)	(0.71)	(0.78)	(3.35)
LnGDP	0.456	-0.449	-0.201*	0.020	-0.143***	-0.114**	-0.189***
	(1.51)	(-1.49)	(-1.87)	(0.38)	(-2.94)	(-2.45)	(-5.38)
GSP	-0.296***	0.297***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3.88)	(3.90)	(-1.72)	(-1.84)	(-0.07)	(-0.23)	(-0.44)
Expense	0.246	-0.260	0.443***	0.190***	0.008	-0.040	-0.012
	(1.01)	(-1.07)	(5.81)	(4.27)	(0.19)	(-0.91)	(-0.39)
_cons	13.434***	-12.381***	-3.577***	-2.763***	1.148**	1.467***	1.696***
	(3.99)	(-3.69)	(-3.38)	(-4.90)	(2.11)	(2.70)	(4.18)
N	6325	6325	394	1107	1148	1257	2419
adj. R^2	0.049	0.049					
Pseudo R2			0.117	0.021	0.01	0.01	0.021

度，它决定了农民生活质量的下限，能够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能够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直接导致外出务工意愿的降低，从而会进一步放大宗族网络的牵制作用，导致政策性社会保险制度负向调节宗族网络与外出务工之间的关系。

表5中列（3）和列（4）的结果均显示，商业保险对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正向调节作用，由此假设2b得到验证。由于商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的补充性风险保障产品，刘宏等研究表明经济条件是购买商业保险的主要因素[29]，即农村人口为了达到购买商业保险条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外出务工，增加个人收入水平，在这种意愿下，宗族网络会降低对自身的牵制作用，即商业保险正向调节宗族网络与外出务工之间的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角度系统研究了宗族网络、社会保险制度、商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一是，宗族网络整体上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二是，男性受到宗族网络的影响要高于女性，家庭规模显示出

表5 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1)	(2)	(3)	(4)
Clan	11.283***	0.208	2.143***	0.246***
	(4.15)	(1.30)	(7.62)	(3.42)
Clan*LnSI	-1.071***	-0.015		
	(-2.92)	(-0.71)		
Clan*LnCI			0.433*	0.203***
			(1.88)	(2.17)
LnSI	2.855***	0.107***		
	(8.23)	(5.16)		
LnCI			-0.007*	-0.123***
			(-1.91)	(-3.21)
LnGAP	-1.755***	-0.006	-1.712***	-0.011
	(-9.31)	(-0.50)	(-6.32)	(-0.541)
LnNGAP	1.355***	0.028***	1.244***	0.031***
	(7.98)	(2.79)	(7.15)	(2.74)
LnGDP	-1.016***	-0.155***	-1.001**	-0.211***
	(-2.78)	(-7.16)	(-2.41)	(-7.43)
GSP	-0.102	0.025***	-0.094	0.031***
	(-1.12)	(4.59)	(-1.13)	(4.45)
Expense	-0.697**	0.199***	-0.493*	0.116***
	(-2.37)	(11.19)	(-1.93)	(10.33)
_cons	35.841***	-1.686***	37.441***	-1.252***
	(7.93)	(-6.27)	(8.18)	(-5.71)
N	6325	6325	6325	6325
adj. R^2	0.059		0.071	
Pseudo R2		0.33		0.24

对宗族规模与劳动力转移关系的显著正向影响；三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险水平保险偏低，稳定性较高，对于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存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四是，商业保险补充保障灵活，自我选择范围广，对于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正向调节。本研究主要结论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强化宗族网络的正面效应，推进农村宗族网络治理。宗族不仅通过亲缘关系发挥直接作用，同时通过网络的纽带关系发挥间接治理作用，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同时要注重宗族网络和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打造以农村治理为主，宗族网络治理为辅的农村治理格局，消除由于亲缘关系导致的非正当交易行为。第二，由于农村社会保险设计中没有失业保险制度安排，建议畅通信息渠道，加强就业平台建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增收。第三，加强商业保险对农民的覆盖，特别是对进城打工人群的覆盖。在商业保险设计的时候应与现有的新农合制度相互补充、相互衔接，最大发挥农村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合力作用。第四，进一步配套和完善老人和儿童照护体系的建设，以此消除女性外出就业时对家庭照料的顾虑。同时企业应当赋予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及其他劳动者平等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女性农民工在企业追求自我价值，提升自我修养，拓展知识体系。

参 考 文 献

[1] 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10，95.

[2] Greif A.，G. Tabellini.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2)：135-140.

[3] 陈斌开，陈思宇．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J]．经济研究，2018，53（3）：35-49.

[4] Tsai，K. S. Imperfect substitutes：the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l finance and microfinance in rural China and India[J]. World Development，2004，32：1487-1507.

[5] Munshi，K.，Rosenzweig，M. Why is mobility in India so low？ social insurance，inequality and growth [D]. NBER Working Paper，2009.

[6] 阮荣平，郑风田．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J]．经济学（季刊），2013，12（1）：331-356.

[7] 董静，赵策，苏小娜．宗族网络与企业创新——农村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协同与平衡[J]．财经研究，2019，45（11）：140-152.

[8] 张博，范辰辰．宗族文化与微型金融机构发展：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J]．经济评论，2019（6）：134-147.

[9] 郭云南，姚洋．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管理世界，2013（3）：69-81，187-188.

[10] 谭华清，黄昊，张辉，等．城乡劳动力转移中的先驱效应[J]．南开经济研究，2017（5）：136-153.

[11] Munshi K，Rosenzweig M. Networks and misallocation：insurance，migration and the Rural-Urban wage gap[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1)：46-98.

[12]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206.

[13] 郭红东，丁高洁．关系网络、机会创新性与农民创业绩效[J]．中国农村经济，2013（8）：78-87.

[14] 费孝通．从父（母）居影响社会关系内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7-26（012）.

[15] Freedman，Maurice.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uangtung*[M]. London：Athlone Press，1971.

[16] Waton，Janmes.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17] Chantarat S，Barrett C B. Social network capital，economic mobility and poverty trap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2012，10（3）：299-342.

[18] Kinnan，C，Townsend，R. M . Kinship and financial networks，formal financial access and risk reduc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3）：289-293.

[19] Munshi，K.，Rosenzweig，M. Why is mobility in India so low？ Social Insurance，Inequality，and Growth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4850，2009.

[20] 胡颖，叶晓华．经济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关系[J]．产经评论，2011，11（6）：131-138.

[21] Gustman A. L.，SteinmeierT. L.. Pension portability and labor mobility：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3，50(3)：299-323.

[22] 陈元刚，徐智垠．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依赖现状及防范研究——以重庆市涪陵区部分乡镇、湖北恩施市屯堡乡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2013，27（10）：32-37.
[23] Gao Q，Wu S，Zhai F. Welfare participation and time use in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5,124：863-887.
[24] 李江一，李涵.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来自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动态，2017（3）：62-73.
[25] 秦雪征，周建波，辛奕，等. 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以北京市农民工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14（2）：56-68.
[26] 贾昊文，王晓全. 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行为会促进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吗？——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J].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35（2）：73-82.
[27] 向国成，曾小明，韩绍凤. 农村家庭异质性、转移就业与收入回报——基于匹配估计量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3（11）：46-56.
[28] 吴玉锋. 社会阶层、社会资本与我国城乡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J]. 中国软科学，2018（6）：56-66.
[29] 刘宏，王俊. 中国居民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研究——基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角度[J]. 经济学（季刊），2012（4）：1525-1548.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lan network and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ZHAO Binbin，CAI Hong

（*Urba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Based on CFPS data，OLS and probit model，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lan network and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Taking social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as moderating variables，it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their impact on labor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informal system represented by clan network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labor transfer.（2）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and family siz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n network and labor transfer.（3）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as a formal system，has an obvious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clan network and the labor transfer. While social insurance has achieved full coverage with poor portability，which weak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lan network on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commercial insurance compensates for the shortag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improv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lan network on labor transfer.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odern vit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building the basic social insurance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we should develop more commercial insurance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and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ransfer and the quality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tegration.

Keywords：Rural clan network；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Social insurance；Commercial insurance

（编辑：牛晓霞）